

蘇東「對華國際」瓦解始末

——以中國與東德關係為中心

• 童 欣

摘要：「對華國際」(Interkit)是由超級大國蘇聯於1967年為協調蘇東集團各國反華政策而直接出面組建的反華國際組織，它在中蘇關係最緊張的時代鞏固了以蘇聯為核心的反華同盟，構成了該集團的信息傳導體系。自二十世紀60年代初起，中國就為分化蘇聯與東歐國家而制定了「區別對待」政策，卻未能取得預期效果。1976年後，中國逐步確立了改革開放大方向，對東歐國家的外交趨於謙遜化和務實化，區別對待政策開始起作用。而東德因其國家利益與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家發展戰略的深度契合，使之頂住蘇聯壓力，轉變了對華態度。隨着蘇聯對華政策的不斷搖擺，以東德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在對華國際會議上與蘇聯代表相互牴牾。對華國際在它們眼中的重要性進一步下降，最終導致該組織於1986年瓦解。

關鍵詞：蘇聯 「對華國際」 東德 冷戰 德國統一社會黨

中蘇關係於二十世紀60年代初完全破裂之後，蘇聯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在自己周圍，展開了一場針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冷戰。在這場「冷戰中的冷戰」裏，蘇聯為協調蘇東集團各國反華政策，於1967年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對華國際」(Interkit)，其俄語名稱Интеркит源自於「國際」(Интер)和「中國」(Китай，音譯「契丹」)一詞^①。在它存在的近二十年時間(1967-1986)裏，對華國際共舉行過十多次副部長級別的全體會議，此外還有一系列經濟協調會議和相關的「學術交流」會議。其成員國最初為蘇聯加上東歐五國(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蒙古，後又陸續增加了越南、老撾和古巴。蘇聯是對華國際的核心和主導者，而在1982年後則逐漸喪失了對於其他成員國對華政策的控制力。

* 感謝匿名評審人、韓鋼老師、蔣華杰老師對拙文的指點。

拉幫結派是政治的常態，國際政治也不例外。近兩百年來，隨着中國捲入國際政治日深，敵視中國的國際集團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它們大多由於一時의共同目標而成立，並隨着目標達成而解散，如清朝末年的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之類——確切地說這類反華集團是一種懲戒同盟，因為彼時孱弱的中國僅僅是列強侵略的對象，而非值得聯合起來對付的對手。而像對華國際這樣由大國直接出面組建，並且長期以敵視中國為其核心目標的國際組織則前所未有，後亦未見，因此研究它的價值遠不限於理解中蘇關係。對華國際在十多年的時間裏集合並協調了蘇東陣營內部的反華力量，中國曾多次嘗試突破卻不得其法，直到1970年代末才在改換了外交方針之後得以鬆動該聯盟。探究其中的成敗利鈍，能給今人以啟示。而東德(官方名稱為「民主德國」，全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國所扮演的角色，亦頗值得後人玩味。

最終停辦對華國際固然是蘇聯的決定，但中國對外政策和東歐國家對華政策的轉變也在對華國際的瓦解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和東歐國家逼着蘇聯不得不改弦更張——因為在對華國際存在的最後兩年裏，它已經失去了維繫蘇東國家反華統一陣線的作用。所以，研究對華國際也可以觀察中國走出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內政、外交政策在蘇東陣營中的反響，並藉以探究冷戰後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

然而，即使是在蘇東相關檔案已經大批解密的今天，對於對華國際的學術研究仍然比較少見。其中，赫什伯格 (James Hershberg) 等人在2011年為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冷戰工作坊編寫的文章最先用新材料全面介紹了該組織的瓦解過程^②。在較新的研究中，札龍泰 (Balázs Szalontai) 逐年討論了對華國際會議上對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辯論，指出蘇聯的主要目的是以中越關係的惡化作為例證，令東歐國家相信中國的擴張主義，從而與堅定反華的蘇聯站在一起。然而，東歐國家在印度支那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微小，使得蘇聯的做法在短短幾年內就失效。對於對華國際，札龍泰聚焦在越南的行動和蘇聯對印度支那話題的利用上，而對中國的應對和東德的行動討論較少^③。國內學者發表的關於對華國際的學術論文更少，直接相關的僅有馬細譜一篇透過對華國際來探討蘇聯干預中國與東歐國家外交的論文^④。這些文章均以蘇聯的對華政策和中蘇關係為討論重點，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對華國際研究中理應包含的「非蘇聯因素」，即中國的對策和東歐國家的策略。

對華國際是否一個反華組織，在學術界尚有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它是一個反華組織，例如美國學者王大衛 (David Wolff) 就認為：「對華國際是從國際部領導人和中國專家的會議演變而來的影子組織，它在冷戰內部開闢和發展『第二戰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⑤針對「反華組織」這一說法，沈志華認為：「就『機構』而言，『對華國際』顯然並不具備『組織機構』的要素，它只是一個定期召開的會議；而以『反華』定性，則更是以偏代全。蘇共中央召集此會議的明確目標確實是想使蘇東集團在反華政策上協調一致，既而形成一條反華戰線。但是，蘇聯的這一目的並未完全實現，畢竟蘇東集團已不是鐵板一塊，在對華關係問題上，他們各自也有自己的戰略考量……」^⑥筆者認為，說對華國際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組織是有道理的，因為它沒有常設機構或

秘書處。不過，如果我們將七大工業國(G7)峰會視為一種國際組織，則對華國際的組織化程度並不低於類似組織。至於其反華性質，則有下文所引述的諸多文獻可以證明。對華國際當然不會將「反華」寫在會議的宗旨裏，在對外宣傳中它只自稱是一個交換各國對華情報和認識的定期會議，但其成員國無疑明確反對毛澤東1960年後的內政、外交政策(即所謂「毛主義」)和執行此政策的中國共產黨。「知華」是該組織的手段，「反華」才是使命(無論這個使命是否最終達成)，否則難以解釋它正好成立於中蘇矛盾趨於高潮之時，又在中蘇關係趨於解凍時解散。因此，筆者認為對華國際是一個形式鬆散的反華組織，而不僅僅是一系列定期會議。在不開大會的時候，對華國際成員國之間也有落實會議目標的協作和小型會議(比如經濟工作會議)。定期召開的大會，其實是由較高級別領導人參加的通氣會和總結會^⑦。

先行研究已經發現，東德在對華國際的瓦解過程中扮演了特別突出的角色。例如舍費爾(Bernd Schaefer)專門介紹了東德與蘇聯之間對華情報的交換，以及東德在1980年代之後對於蘇聯共產黨對華的僵硬態度的某些不滿。該文甚至暗示，東德對中國友好惹惱了蘇聯內部的一些高層，以至於這些人組成了反對東德的團體，導致被蘇聯拋棄的東德難逃覆滅的命運。所以到了2004年還有原東德幹部在反思，為了結好中國而得罪蘇聯，是不是代價太大了^⑧？誠如論者非常準確地指出：「在東德—蘇聯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積極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這不僅是為了聲望，也是為了獲得東德商品的潛在市場。」^⑨但該文的討論僅限於1982年後，而忽略了事實上更為關鍵的1975至1982年這段時期。東德對華政策從極端反華到相對親華的轉變，到1982年已經基本完成，真正的試探、評估和在對華國際內部的博弈均發生在1982年前。

中文世界內有一些涉及1978至1986年期間中國與蘇東國家外交關係的學術研討會^⑩，但尚沒有專門針對這段時期中國與東德雙邊關係發展的研究。牛軍認為，中國改變對東歐五國的外交政策並不取決於中國同這些國家雙邊關係的狀況，而是源自於中國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轉變^⑪。這一判斷當然是準確的，但兩國關係的發展並不僅僅取決於中國一方的政策，即使中國改變國家發展和安全戰略，也要視乎對方如何看待這種變化，同一時期的蘇聯並未在1980年代初真正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東歐五國中保加利亞的轉變也比東德慢得多^⑫。

關於中國與東德在冷戰後期的外交關係，歐洲學者的研究更加全面。德國學者邁斯納(Werner Meißner)所編的的檔案集收錄了幾份東德方面討論中國文革之後路線轉變的檔案，使研究者能以管窺豹^⑬。法國學者嘉德(Claudie Gardet)的研究是第一部用德方檔案研究中國與東德關係的全史，但偏重於記錄大事，缺乏歷史細節^⑭。曾經於1980年代初在東德駐華大使館工作的克呂格(Joachim Krüger)發表過多篇關於中國與東德關係的論文，其中一篇直接與本文研究時段(1967-1986)相關，並選取兩篇德國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以下簡稱「統社黨」)內部對於中國的情報分析^⑮。

博德 (Marcel Bode) 於 2013 年寫成的碩士論文對中國和東德在 1978 至 1990 年的關係有非常洗練的描述，還採訪到三位親歷者，但限於篇幅 (全文約七十頁)，不可能清楚地闡明 1978 至 1982 年這段時間內兩國交往的細節^⑥。于寧 (Yu Ning 音譯) 於 2015 年寫成的博士論文專注於東德方面的對華政策，梳理了中德交往的重要節點和蘇聯主導的對華國際對於兩國關係的影響。然而，這篇論文僅在少數章節引用了未刊檔案，其他地方均借助於邁斯納的檔案集和二手文獻，卻未能見到對文本形成原因的細緻分析^⑦。

綜觀上述分析，尚無研究在 1978 至 1986 年這個時段上將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與東德關係正常化和對華國際的瓦解三者聯繫起來。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勉力論證以下觀點：中國確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歐洲弱化了此前「以蘇劃線」的外交方針，以及中國對東歐國家外交的謙遜化和務實化，是其 1960 年代初制定的「區別對待」政策能夠起作用的前提，而東德的國家利益與中國發展戰略的深度契合是東德頂住蘇聯壓力、轉變對華態度的條件，此二點合而為一，才讓東德成為導致對華國際瓦解的關鍵國家。

一 對華國際的成立與中國的對策

1967 年 12 月 14 至 21 日，蘇東七國執政黨 (蘇共、德國統社黨、波蘭統一工人黨 [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以下簡稱「統工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Komunistická strana Československa]、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 [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以下簡稱「社工黨」]、保加利亞共產黨 [Българска 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а Партия] 和蒙古人民革命黨) 國際部的主要領導人齊聚莫斯科，召開對華國際成立大會，商討應對中共以及所謂「毛澤東集團」的共同政策 (表 1)。會上達成的共識是^⑧：

1. 將有關中國局勢和毛澤東集團政策的研究材料彙編成一份統一評估；
2. 口頭交換關於以上事件的資訊；
3. 就進一步討論毛澤東領導集團的政策交換意見，並就在這一方面進行合作研究和共用資訊交換看法。

最初的對華國際其實並不是國際會議，而是一個黨際會議。首次對華國際大會的參與者都是蘇東各黨國際部的領導人，其討論的主要議題是與中共領導人相關的意識形態問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問題，重點之一是對中國的外宣進行反宣傳，實質上是中蘇論戰的一個延續。其成員國以華沙公約組織為班底，剔除了在中蘇論戰中相對中立的羅馬尼亞，而添加了一向忠於蘇聯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在 1968 年，蘇共甚至還算是對華國際內部的溫和派，它將中國視作冷戰中的「第三力量」，保留聯合中國對抗美國的可能性。而某些成員國更加激進，比如保加利亞代表堅持認為：只要中國反對蘇聯，就只能被視為帝國主義者的幫兇^⑨。至於東德，在中蘇論戰初期觀望過一段

表1 對華國際歷次會議列表

會次	時間	地點	要事
第一次會議	1967年12月14至21日	莫斯科	成立大會；主題為「關於中國和毛主義」
第二次會議	1969年1月28至31日	柏林	蘇聯建議各國在外交部政治司設立中國問題處
第三次會議	1970年3月10至13日	華沙	關注中國的「區別對待」政策
第四次會議	1971年2月15至18日	索菲亞	指責中國想讓東歐「羅馬尼亞化」
第五次會議	1972年7月3至5日	布拉格	討論中國國內的穩定問題和中美關係
第六次會議	1973年5月16至18日	莫斯科	對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分析
第七次會議	1974年3月25至26日	布達佩斯	討論中國的經濟、軍事問題以及黨內鬥爭
第八次會議	1975年6月24至28日	烏蘭巴托	策劃進行反對「毛主義」的宣傳
第九次會議	1977年6月15至16日	柏林	討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古巴正式加入
第十次會議	1978年12月11至13日	哈瓦那	討論中美關係升溫對古巴、越南的威脅
第十一次會議	1980年6月11至13日	梅爾基	討論中國的威脅；越南正式加入
第十二次會議	1982年5月11至12日	索菲亞	東德對於蘇聯的對華政策提出異議，並拒絕在會議報告上簽字
第十三次會議	1983年12月6至7日	布拉格	討論趨於學術化
第十四次會議	198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季哈尼	積極拉攏中國反美
第十五次會議	1985年2月18日	莫斯科	對華國際會議的重要性進一步下降

資料來源：除了下文所引述的檔案材料之外，此表還參考了〈對華國際會議目錄〉，載赫什伯格 (James Hershberg) 等選編，羅曦譯：〈蘇聯集團國家有關中國和對華國際文件節選 (1966-1987)〉，《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2輯 (2011年12月)，頁365。

時間之後，早已是鄧小平口中東歐國家裏對華關係「最差的」一員，且中國駐東德大使館亦認為「德黨態度之惡劣較東歐各國更甚」²⁰。

隨着中蘇矛盾的進一步升級，1969年爆發的「珍寶島事件」(蘇東國家和西方稱之為「烏蘇里江衝突」)使得對華國際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此後的對華國際會議的討論重點從原先的中共理論(即所謂「毛主義」)擴展到評估和分析中國的軍事、經濟和外交政策。對華國際的新共識是：各成員國應仿效蘇聯，不單在政治局，而且要在外交部、科學院成立「中國委員會」或「中國辦公



1955年5月14日，歐洲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在波蘭首都華沙簽署《華沙公約》(Warsaw Pact)。(資料圖片)

室」一類機構，同時各成員國之間還應該相互溝通，不間斷地交換和討論有關中國政策的分析。從此，對華國際由黨際組織真正轉變成為類似於1947年成立的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那樣針對敵國的冷戰機構，是一個以蘇東各國執政黨國際部、政府外交部、科學院為核心，並且影響各成員國一切涉華部門(如國防部、外貿部)的反華國際組織^②。不過，同時也應看到對華國際不是某種可以比擬共產國際(Comintern)的嚴密組織，而是一個以蘇聯為主導力量的勸導型組織，其協調各國對華政策的能力與蘇聯的決心成正比，與蘇聯對華政策跟其他成員國自身利益的背離程度成反比。

1968年蘇聯領銜帶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後，蘇聯將本國意願強加於對華國際各成員國的意志和能力達到了一個高峰，而東歐各國此時也擔心中國將其火熱的文革運動輸出到本國，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願意接受蘇聯對於自身對華政策的領導。再加上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接連又發生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M. Nixon)訪華事件，蘇東各國對於交換涉華情報的需求激增，從而讓對華國際進入了一個空前活躍的時期^②。

按照蘇聯理論部門在一份情況通報中的分析，在中國接待尼克遜訪華並「與美帝國主義勾結」之後，統治中國的依然是一種自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開始的「軍事—官僚獨裁」體制；中國的反蘇態度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其危險性在毛澤東「準備戰爭」的口號中顯露無遺^③，「毛主義本質上是反動意識形態。客觀上，它與帝國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組成了一個『統一戰線』……它沒有建設性的內容，這使得中國領導人渴望在國際共運和第三世界中取得霸權的願望變得更加危險」^④。這樣一套說

法，基本被對華國際各成員國接受。在1973年德國統社黨下發到基層黨組織的學習材料《情報》(Information)中，中共被貼上了五大「罪狀」²⁶：

- 第一，中國反對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
- 第二，在裁軍問題上，已經與美國勾結的中國站在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一邊；
- 第三，在關於亞洲和越南的問題上，放棄了批判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
- 第四，試圖組建全球反蘇統一戰線；
- 第五，分裂國際共運，以社會沙文主義的「毛澤東思想」替代馬列主義。

應該說，蘇聯在1969至1976年這個階段成功地實現了它創建對華國際的目的，各成員國的對華敵對政策比較一致。一方面，這段時期正好是蘇聯決心統一陣營內部思想相對堅定、在冷戰對峙中氣勢亦相對佔優的時期。另一方面，這又是中共的意識形態較為僵化，甚至一度嚴重影響黨際、國際外交活動的時期。

針對蘇東反華同盟，中國亦決心反擊。自19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開始，中國對東歐諸國採取的即是區別對待政策，也就是說，中共在與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爭執的時候，其調門比中共對蘇共的攻擊要低。1964年後，更是採取了「豺狼當道，焉問狐狸」策略，幾乎停止了對東歐各黨的攻擊。然而，中國的這些策略在1976年前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1976年前，對華國際會議中雖偶有不要給中國領導人扣帽子的聲音，但東歐諸國（更不用說蒙古）在對華政策方面都未脫離蘇聯劃定的範圍。正如李丹慧所言，「總體來講，中國在1960年代對蘇東集團的外交方針是失敗的……非但沒有達到分化蘇東集團的目的，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蘇東集團的凝聚力」。事實上，到1976年為止，情況並沒有太大變化²⁷。

東歐諸國中，東德作為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國家和華沙公約組織的核心成員，受到中蘇雙方的共同重視。中共在執行區別對待政策時，特別注意在德國統一問題上予以百分之百的支持，並且一再指斥蘇聯在追求與西方緩和的過程中出賣了東德。可是東德不但依舊唯蘇聯馬首是瞻，而且還專門在對華國際會議上主動剖析中國的區別對待政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四個：第一，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批判東歐國家的調門雖然相對較低，卻從未放棄在東歐各國內部尋找所謂「健康力量」（支持中方立場的人），引起東歐各執政黨的反感²⁸；第二，中國反對美蘇在歐洲實現緩和，這背離了東歐國家的期待；第三，1970年代的東德政府放棄了對德國統一的追求，因此也對中國堅持德國必須統一的呼聲不再感興趣；第四，在昂納克於1970年代初取代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德國統社黨的領導地位之後的最初幾年裏，他必須表現得比前任更加親蘇以鞏固自身的地位²⁹。然而，此時中國的內政狀況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完全放棄意識形態上的高調，接受其他國家「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的「朝拜」也是毛澤東宣傳文革的一種方式³⁰。同時，中國自身尚未實現國家統一的狀況，也使得它不能允許東德「擅自」放棄統一追求。這些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方面的結構性衝突令中國爭取東德的努力注定成果有限。

從1970年代末開始，中國區別對待政策遇冷的局面開始逐漸發生變化，東德從對華國際內蘇聯的「馬前卒」變成了導致整個對華國際解體的關鍵因素，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二 文革結束後區別對待政策逐漸在東德起效

在昂納克鞏固了自身地位之後，東德領導層已經有心在外貿等領域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緩解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壓力。1970年，東德80%的原油需要蘇聯供給。但自從1973年石油危機導致石油價格暴漲之後，蘇聯履行其對東德的石油交付義務時總是拖拖拉拉。雪上加霜的是，原本還能世界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的東德工業品，隨着東德技術水平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而滯銷。東德領導人認為，如果中共真正放棄文革時期干涉歐洲緩和的激進路線，而重回1956年中共八大的注重本國經濟發展的路線，則東德或有望再次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⑳。

為實現這一願景帶來緊迫感的是中國與西德（又稱「聯邦德國」，全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關係突飛猛進的發展。從1970年代初開始，西德已經取代東德成為中國人了解德國文化的主要視窗，幾乎所有中國學生的德語教材都出自西德，西德人甚至包辦了對東德文化的介紹。1977年10月，西德外交部部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首次訪華，在會見多位中國領導人後與中方簽署了加強文化交流的計劃書。1978年4月，中國外貿部部長李強訪問西德；5月28日至6月7日，出訪西歐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及其團隊訪問西德，這一系列互訪令雙邊關係日趨緊密^㉑。東德情報部門在同年10月提交給政治局的報告中提到，中國與西德關係的深度和廣度正在不斷擴展^㉒。因此，東德從1978年初開始就懷着急迫的心情積極構建獨立於蘇聯的對華情報網絡，為決策層制定最符合本國利益的對華政策服務。東德為此不但增加了與中國外交機構之間的接觸，還物色漢學家作為國家安全部門的「非正式工作人員」（又稱「線民」）到中國留學，伺機收集情報，以判斷中國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的動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意圖^㉓。

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即「斯塔西」[Stasi]）還從其他方面獲悉：1976年「四五運動」發生後，鄧小平在地方行政機構中擁有大批同情者，「四人幫」與鄧的衝突分裂了黨的最高層^㉔；到了1977年底，中國的國內政局已日趨穩定，學校內秩序恢復，「現在的中國又回到了毛澤東的路線上了。這不是甚麼新的路線，只是之前被『四人幫』破壞了而已」^㉕。這類反映局勢迅速變化的情報有時會讓東德方面感到困惑，但在東德政府看來，一個逐漸穩定的中國肯定是更值得交往的對象。事實上，東德開展對華外交的出發點一直與蘇聯不盡相同，蘇聯在意中國對其國際共運領導地位的威脅，而東德關切的是歐洲安全問題（免遭西方進攻）、經濟利益、國際地位、與西德競爭等。以統社黨國際部副部長馬洛（Bruno Mahlow）為代表的「知華派」認為，東德作為一個被西方世界孤立的小國要想擺脫困境，應該全力爭取

中國這樣的大國對自己保持善意。馬洛此時是統社黨高層中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專家，早在中蘇分裂前就已從事聯絡中共的事務^⑳。

1978年12月11日，對華國際第十次會議在古巴哈瓦那召開，重點討論了中國對越南等周邊國家的威脅。東德雖然在會議上維持了嚴厲的共同對華立場，但其對華政策中促進與中國經貿關係發展的措施，其實給自身開展積極的對華關係保留了足夠空間^㉑。就在東德領導人開始用新眼光打量中國時，1979年2月17日發生的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讓蘇東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再次加劇，昂納克等人期待的對華關係正常化似乎頓時又變得遙不可及。

就在對華國際哈瓦那會議舉行的同時，中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基調的中央工作會議也接近尾聲。其實，中國正在發生的另外一些相當重要的變革，讓中國二十多年來沒有顯著效果的區別對待政策開始發揮作用。鄧小平於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發表講話，號召全黨「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他的講話大多是針對內政而發的，有一些內容卻對中國與蘇東國家關係產生了直接影響。比如他說過去幾年「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運動上去了，建設的本領沒有學好，建設沒有上去，政治也發生了嚴重的曲折」，而現在「要搞現代化建設，就更加不懂了」，所以要重新學習，「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㉒。這些看法為此後中國外交的謙遜化奠定了基調。

東德情報機構此時對中共路線的判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改正了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卻依然堅持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各領域的指導思想，此次全會的決議是妥協的產物，「試圖將實用主義與自願主義、國家現代化與軍事化相結合」，其目的是在一定範圍內「擴大領導層的行動能力」，然而其結果卻有可能導致意識形態混亂——從中國民眾的大量大字報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悲觀、失望甚至懷疑^㉓。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作這樣的解讀，顯示出東德情報機構尚未擺脫蘇聯對華政策的思維模式，未能看出中國已經確立了新的發展路線^㉔。時任東德外交部遠東司司長貝特霍爾德(Rolf Berthold)後來在採訪中談及對鄧小平發言的感受時說：「那時候，我們還不能百分之百確定中國的政局會走向何方。我們結合自己以往的經驗討論了這篇講話，並嘗試着進行分析。然而，我們那時並不能清楚地判定在中國已經發生了一場大轉折。」^㉕

事實上，此時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變掃清了中國與東德關係正常化中最大的障礙。自中蘇論戰開始之後，中國一直認定自己走的是一條比蘇東國家更加正確的道路，因而特別看重對方的認同（或至少像羅馬尼亞那樣保持相對中立），而且在對別國執政黨失望時，甚至改變「過去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不交朋友」的做法（這裏的「朋友」顯然指的是特殊的工作對象），有意支持其國內、黨內認同中共的「健康力量」^㉖。而學習這些所謂「修正主義」國家的法制、經濟措施，幾乎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情。文革結束之後，經濟建設逐漸成為了中國政府的核心任務，學習和借鑒包括蘇東國家在內的政治理念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先進經驗，成為中國政府對外交往中的重要內容，而「階級鬥爭」

一類的話語則從中國政府的對外宣傳逐漸淡出。如此一來，東德在與中國交往時的顧慮大大減少，能獲得的利益卻在增加。

當中國很快於1979年3月初開始從越南撤兵之後，東德領導人的對華態度迅速緩和。蘇聯也觀察到東德渴望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И. Брежнев)於7月警告昂納克：「與中國的談判需要極大的耐心、謹慎，以及對我們每一個步驟的精確計算。話雖如此，我認為，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重要的是不能削弱對中國政策的對抗，中國的政策是與和平及國際安全目標背道而馳的。」^{④③}如果中國的對外政策還像文革時代那樣顯得咄咄逼人，那麼蘇聯的警告無疑會起到很大作用。可是，中國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遍外交官在這一時期的外事活動大都呈現出謙遜化的表現，往往在外賓面前主動反思中國發展道路中的失誤，比如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同年8月2日會見塞內加爾社會黨(Le Parti Socialiste du Sénégal)代表團時說：「各國情況不同，不能照搬外國經驗。我們走了二十多年，現在回過頭去看一下，我看有些也過急了一點。」^{④④}對落後的非洲國家尚且如此，對東德這樣的發達國家更不用說。事實上，與東德接觸的中方外事人員常常表示要學習對方的先進經驗(下詳)^{④⑤}。

與此同時，中國對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的外交策略也趨於務實化。在1979至1982年這段時間內，中國執行的仍然是1972年以來「聯美抗蘇」的基本戰略，其標誌是1979年4月初通知蘇聯不再續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中國反蘇的目的和手段都發生了很大轉變。1978年後，中國的一切政策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鄧小平眼裏「最大的政治」^{④⑥}，就發展經濟而言，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係比中蘇關係重要得多，鄧小平並不願意在蘇聯不作出重大讓步(消除中蘇關係正常化「三大障礙」——蘇聯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大規模部署軍隊、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積極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三大障礙」全都位於中國周邊)的情況下實質性地改善中蘇關係^{④⑦}。

對中國來說，對蘇關係的核心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防範蘇聯入侵和打破蘇聯及其盟友的戰略包圍，所以抗蘇的重心被擺在與國家安全直接相關的周邊地區，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半島和阿富汗這兩條戰線上遏制蘇聯及其盟友的擴張。中國在周邊地區依然積極支持一切願意加入「抗蘇統一戰線」的力量，包括紅色高棉和東南亞地區的共產黨，為此不惜付出物資和外交上的代價^{④⑧}。而對於歐洲、非洲等地區而言，毛澤東時代那種「以蘇劃線」、不惜血本地支援「國際反修力量」，乃至積極介入安哥拉內戰的情況再也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李先念所提出的「要給也要撈」的平衡援助模式^{④⑨}。換句話說，1978年後的中國收縮了反蘇戰線，減弱了其中的意識形態意涵而專注於國土安全，對於中國周邊之外的地區而言，親蘇不再必然是打擊的對象，就像反蘇也不必然是獲得大量援助的藉口一樣。這樣的姿態逐漸為東德所接受，德方觀察到中方一再表示理解東德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和追求歐洲緩和的願望，主要的合作訴求集中於經貿和科技方面^{⑤①}。所以，當東德發現中國的政策事實上有利於自身的國家利益時，難免就會在蘇聯鞭長莫及的時候自行其是。

從這一時期的德方檔案看，東德理解中國各項新政策需要時間，但對中國外交務實化的認識日漸深刻。1979年7月和8月，東德駐華大使館貿易處向東柏林傳回新的情報，措辭依舊十分謹慎且不超出對華國際對中國政局的分析框架。這兩份名為〈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後中國國內政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後的內政、外交政策〉的報告認為：中國當前路線的實現存在普遍的不確定性，儘管許多基層人員和勞動人民對過去六個月採取的措施表示歡迎，包括工作重心轉向經濟，但他們無法確定和確信所有措施在意識形態上是否合理；同時，報告還認為中國此時的經濟情況不容樂觀，工業增長率低於預期（1978年計劃為8%），財政領域的情況並不理想，工業和運輸業的任務非常緊張。但是，這些報告還是捕捉到一些中國發展的新氣象，比如中國為了發展經濟而「解除對原地主、富農、資本家的限制等措施」，「近幾個月來，中國的文化生活變得豐富」。東德駐華大使館貿易處認為，總體上看當前中國外交活動是「對世界政治的建設性貢獻，為中國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⑤1}。

就在東德逐步從新獲得的情報中扭轉對中國的印象之時，蘇聯突然於1979年12月26日出兵阿富汗，東德、中國、蘇聯三者之間的關係又為之一變。在此之前，東德政府一直寄希望於中蘇關係能夠有所改善，從而使蘇聯的防務重心重新固定在歐洲，而東德也可以在蘇聯的帶領下收穫對華關係正常化的利益。蘇聯入侵阿富汗後，這些設想均成泡影。蘇聯不僅繼續在中國邊境陳兵，而且在中亞又開闢了一個短期內難以獲勝的戰場。與令人失望的蘇聯相比，中國的一系列外交姿態顯得更具吸引力。東德方面漸漸看明白，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正在逐漸固定下來，無論中方的宣傳材料上如何表述，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路線上去。中國的外交策略變得更加靈活，不但不再糾纏從前的意識形態爭論，而且對東歐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特殊關係明確表示理解。甚至連對華國際成員國也都認識到這點並在報告中承認，「中國正在做出保證：鬥爭只是針對蘇聯，不會影響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正常的雙邊關係」^{⑤2}。同時，中國與西德關係的極速升溫也讓東德產生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1978年中國與西德貿易額為27億西德馬克，比1977年增長49%^{⑤3}。蘇東國家還觀察到：在與西方貿易嚐到甜頭後，「中國想從傳統進口清單上削減從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的機械進口」^{⑤4}。

從1980年起，中國的區別對待政策在東德身上完全實現了預期的效果，東德的對華政策明顯偏離了蘇聯所規定的路線。在德國統社黨的政治局裏，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相信蘇聯所灌輸的文革前後北京政治路線本質保持不變的論調；相反，如何通過與北京改善關係來為東德爭取經濟和政治利益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1980年6月11日，對華國際第十一次會議在波蘭小城梅爾基（Mierki）舉行，由政治局委員阿克森（Hermann Axen）帶領的統社黨代表團對蘇聯的對華主張提出了不同意見。其實，早在會議開幕的前一日，對華國際的「靈魂人物」——蘇共國際部第一副部長羅滿寧（Олег Б. Рахманин）已經在華沙「敲打」過東德代表團，他說：在蘇聯國內對中國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但是「目前我們和中國的關係正處於對抗階段……在當前緊張的國際形勢下，比任何時候都取決於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兄弟同盟的鞏固，取決於在所有步驟上，包括在一些細節問題上的協調一致」^⑤。羅滿寧長期負責蘇共政治局內的中國委員會，他出任國際部第一副部長的時間和被迫退休的時間（1968-1987），與對華國際成立和解散的時間高度重合^⑥。然而，羅滿寧的這些警告並沒能阻止阿克森等人，阿克森在會議上強調「對中國的真實情況作出理性而適度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必須關注那些實際的變化」；他非常有技巧地將東德的經濟利益包裝成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需求，即為了阻止「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市場上佔據的主導地位」，必須「維持經濟互助委員會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比重」^⑦。

在實際行動方面，中國與東德已經開始謹慎接觸，而中方的回應不斷鼓勵着東德將步子邁得更大一些，直到取得突破性進展。1981年5月16日，馬洛訪問朝鮮之後，飛赴老撾、越南之前，「順道」到位於北京的東德駐華大使館「歇腳」，期間還邀請中國外交部人員以私人身份到使館進餐，從而打破了雙方高層官員幾十年來缺乏直接溝通的狀況^⑧。兩個月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蘇聯東歐局的陳德興和杜克寧於7月16日至8月23日訪問了中國駐東德大使館，期間亦受到德國統社黨國際部同級官員的友好接待，他們表明了中國希望學習東德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真誠態度，而對於德方對中共提出的批評則不作反駁，以釋出善意^⑨。隨着宣稱要重新審視「一個中國」政策的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W. Reagan）上台，中美關係出現巨大的不確定性，1982年3月23日訪問東德駐華大使館的東德官員埃廷格（Helmut Eltinger）和西貝克（Horst Siebeck）在北京期間受到中方高規格的接待，外聯部第五局副局長宦國英對二人表示，「中國對美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抱任何幻想」。同時，中方再次向對方表示中共想要學習「一切地方」的經驗^⑩。

中國與東德執政黨黨際關係的改善很快促進了兩國各個層面的交往。根據蘇聯情報部門的觀察，在1980年底到1982年初這段時間裏，中國與東德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拓展：兩國間的工會有交流、電視台有合作，兩國互派新聞代表團和外語教師（柏林洪堡大學和北京大學之間）、互派作家和學者參加在本國舉行的國際會議，並於1981年底簽訂了十八項貿易和科技合作的協定。中國與東德之間的貿易仍然依照1950年代以來以貨易貨的支付方式，各自都不需要動用寶貴的外匯。中國為難以在國際市場上獲得青睞的東德工業品提供了市場，根據雙方協定，1982年東德對中國出口的85%將會是工業設備，其中包括2,500輛卡車^⑪。

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的對台政策使得中美關係出現新的波動。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3月24日發表的「塔什干講話」，稱蘇聯「過去完全承認、現在仍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島的主權」，而且願意在「不帶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與中國協商改善雙邊關係^⑫。這既是中蘇關係，也是中國與東德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如果說此前德國統社黨與中共之間的往來還有些「遮遮掩掩」（理論上兩國官員並未互訪，而是去看望本國的使館工作人員），那麼塔什干講話相當於蘇聯開了綠燈，中國與東德的交往從此可以

光明正大地進行，其對華政策再沒有因為蘇聯的態度而產生大幅度的搖擺。1985年5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對東德的訪問，以及同年7月統社黨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書記許雷爾（Paul G. Schürer）對北京的訪問，為完成雙邊關係正常化進行了最後的鋪墊。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就對來訪的許雷爾承諾：「我們同聯邦德國的關係永遠不會傷害民主德國的利益。」^③

1986年昂納克的對華訪問標誌着中國與東德雙邊關係正常化的完成。訪華期間，昂納克分別會見了胡耀邦（10月22日於北京、24日於南京）、趙紫陽（10月22日）和鄧小平（10月23日）。鄧小平承認中國過去在國際問題上犯過一些錯誤，但建議雙方「着眼於未來」，過去的事情「一風吹」^④。胡耀邦對此談得更為具體，他告訴昂納克，現在中共中央之所以沒有像總結內政方面的教訓那樣去談外交方面的失誤，主要是因為：第一，外交的失誤要比內政小；第二，外交是雙方的事情，總結失誤難免翻舊賬，引出新的矛盾；第三，可能會被敵對勢力利用。同時，胡耀邦還向昂納克指明中國處理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新立場，即絕不干涉其內政，絕不干涉其外交，完全尊重這些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特殊緊密關係^⑤。這三點既是委婉地承認中國當年的某些不恰當舉措，更是為了打消東歐國家將來的顧慮。昂納克對胡耀邦的表態非常滿意，稱東德「歡迎並將繼續歡迎你們的外交政策」。中國在與東德重歸於好後，甚至準備與之簽訂期限至2001年的經貿協定^⑥。

東德改善對華關係的意義並不僅限於雙邊關係。隨着東德對蘇不合作的態度日趨明顯，而蘇聯對東德難以制裁，以反華為宗旨的對華國際逐漸陷入「空轉」的境地，最終不免走向瓦解。

三 對華國際的瓦解

勃列日涅夫發表塔什干講話之後，對華國際已面臨嚴峻考驗。儘管勃列日涅夫在發言中並沒有撤銷任何對中國的批評，但其尋求和解的姿態是一目了然的。對華國際自成立以來一直告誡各成員國不可以擅自改變對華政策，可是這次「老大哥」自己居然在未與其他成員國協商的情況下表現出對中國空前積極的態度，這就讓東歐各國一直未敢明言的擔憂變成了現實，導致蘇共在對華國際中威信下降。

然而，即使蘇聯為了落實僵化的對華政策，已經到了違背本國根本經濟利益的地步（更不用說妨礙了蘇東集團內其他盟友的利益），但蘇共內部對於改變對華政策尚無統一的認識。這番塔什干講話成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契機，只是蘇聯後來又一度將講話精神束之高閣，貌似主動的「塔什干路線」竟然後繼乏力，對華政策搖擺不定，最後還是走向對抗中國的老路。在蘇共制定對華政策的核心機構——蘇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內部，波諾馬廖夫（Борис Н. Пономарёв）和安德羅波夫（Юрий В. Андропов）傾向於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羅滿寧和葛羅米柯（Андрей А. Громыко）傾向於繼續打擊中國。波諾馬廖夫並不願意為了對華政策賭上前途，未有正面迎擊羅滿寧等人的強硬態

度；他的下屬切爾尼亞耶夫(Анатолий С. Черняев)在日記中評價他是「一個已經做到黨內小官的政治人物，一生花招玩盡，僅僅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相反，羅滿寧則將自己一手塑造並通行於蘇東集團的關於中國的理論視為進身之階，自1968年成為國際部第一副部長之後，他在此後的十五年裏一直在蘇共中央負責中國事務，絕不甘心在即將參選蘇聯科學院院士的時候，坐視自己的理論著作被當作過時之物扔進廢紙簍。這兩人一軟一硬的態度決定了蘇聯對華政策的走向——要將反華路線貫徹到底的羅滿寧毫不退讓，勃列日涅夫每次有所動搖，他就將蘇聯的對華政策朝着舊路線推一下。早在1982年5月初(塔什干講話發表後一個月)，蘇共的理論刊物《共產黨員》(Коммунист)便發表了露骨地攻擊中國的文章，「彷彿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講話從未存在過」^⑦。

蘇共就這樣帶着對抗中國的態度來參加1982年5月11日在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召開的對華國際第十二次會議，代表蘇共出席的羅滿寧堅持認為塔什干講話只是一個「戰術行動」，對華政策的實質沒有也不應該動搖，甚至還點名批評了昂納克^⑧。就在主宰對華國際的羅滿寧一意孤行時，一個來自蘇共外部的推力為蘇共內部反對羅滿寧的勢力提供了彈藥。只是各方未能預料到，在對華國際內挑頭「造反」的，竟然是幾十年來最「忠心耿耿」的東德人。東德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一員，地處冷戰前沿的位置，擁有巨大的工業、經濟潛力，一向是蘇聯控制最嚴的衛星國。相比之下，羅馬尼亞自中蘇分裂後一直對中國相對友好，但正因為如此，它並沒有成為對華國際成員國。南斯拉夫在中國結束文革後對華關係改善較快，但它在斯大林時代就曾被蘇聯「革出教門」，甚至不是華沙公約國家。所以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對華態度動搖不了對華國際，它們從來就是對華國際各成員國批判的對象。人們沒想到的是，一直緊跟蘇聯對華政策的蘇聯鐵桿追隨者，常常被世界各國詬病為缺乏外交自主性的東德，卻在1982年轉彎最快。

對華國際第十二次會議是東德與蘇聯關係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此時距塔什干講話發表已有一個多月，德國統社黨中央給即將奔赴索菲亞的代表團發出指示：基於三個原因(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即美國)之間的矛盾加劇、中國國內政策的變化、蘇聯的塔什干講話)，目前的形勢「給了兄弟國家以新的機會，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有着積極影響」，而且各國愈來愈注意到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客觀份量；同時，中國也對進行務實交流和發展特定領域內的合作表現出一定的興趣，所以「德國統一社會黨支援採取一項積極的、符合社會主義與和平的長期戰略利益的對華政策」^⑨。這份指示標誌着東德對華政策的全面轉向，並且在轉向前沒有向蘇共中央請示，導致了在會議上雙方代表團的直接衝突。

面對羅滿寧的壓力，德國統社黨國際部代表團團長馬洛坦率地向羅滿寧談及統社黨領導人的新態度：昂納克已經「完全受夠」了對華國際，他認為蘇共的對華政策犯了各式各樣的錯誤，或許到該道歉的時候了。何況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中國有自己的政策也無可厚非。總之，東德政府認為在進行貿易和其他領域的合作時，中國得到的待遇至少不應該比那些資本主義國家

差。羅滿寧不為所動，馬洛則針對蘇共草擬的會議報告提出了一百多條修改意見，並最終拒絕在這份報告上簽字——這在對華國際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事^⑩。

大約一周後羅滿寧「後院起火」，1982年5月20日蘇聯《真理報》(Правда)發表了一篇繼承塔什干講話精神的文章，代表了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的態度。忿忿不平的羅滿寧決心扳回一局。從索菲亞回到莫斯科後，羅滿寧於5月底重新拿出自己的「理論積累」，結合對中國的最新觀察，向蘇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認為中國局勢的特點是「向右轉」，正在走向霸權主義，現在不宜積極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份備忘錄得到蘇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認可，連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也在委員會會議的氣氛下於備忘錄上簽了字——眼看剛剛提出兩個月的塔什干路線已經地位不保^⑪。

羅滿寧還不斷向其他東歐國家吹風，警示它們不可步東德後塵。他於1982年7月初告誡匈牙利駐蘇聯大使：「中國正試圖打『東德牌』」，而「東德報紙對中國的報導過於正面」；蘇共不反對各國逐漸發展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和其他接觸，但倘若過於積極，則有可能客觀上成為中國「擴大的反蘇統一戰線」的一部分^⑫。接着羅滿寧又指揮蘇共國際部向東歐其他兄弟黨發出公開信，讓它們不要急於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種完全與塔什干路線相背離的舉措讓人困惑，蘇共國際部內部的官員也認為：「假如我們想要關係正常化，我們怎能勸別人不要這麼做呢？」^⑬

東德方面對蘇共發給兄弟黨的公開信並不買賬。據時任東德駐蘇聯大使溫克爾曼(Egon Winkelmann)回憶，他在1981年赴莫斯科履職之前，昂納克曾叮囑他：「在我們這裏，除了政治局，誰說了都不算，哪怕是蘇聯大使或莫斯科說了也不算。……東德不是別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只要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合併，我們就自行決定自己的政策。要是他們與我們意見一致，那更好；如不一致，我們就甩開他們自己幹。」^⑭溫克爾曼或許將自己的領導描繪得過於勇敢了，但昂納克在對華政策方面的行動確實具有前所未有的獨立性。7月27日，德國統社黨中央在一封信中以非常不順服的態度反駁了蘇共中央對於東德對華政策的批評，而且還具體拿出一個「關於改善與中國的國際關係、逐步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具體措施和行動的協調計劃，涉及貿易、科技、教育、文化和體育等多個領域」，並再次強調中國作為貿易夥伴的待遇不應低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他東歐國家對羅滿寧的號召也不積極^⑮。

與此同時，蘇聯對華政策的搖擺依然在繼續。1982年8月初，勃列日涅夫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一方面暗示屬下不要將中國推向美國，使得屬下刪去了羅滿寧所授意發表的文章裏對中國內政的攻擊，削平了其中的稜角^⑯。另一方面，他並沒有讓蘇聯的對華政策完全重回塔什干路線，而且決心管束東歐國家與中國的交往。8月11日，訪問東柏林的勃列日涅夫在得知昂納克不久前接見了中國駐東德大使李強奮後，當面警告他：「中國人真正想要的是甚麼？事實表明，他們想顛覆社會主義共同體內部的關係，從而削弱我們每個國家。」昂納克的回答滴水不漏：「民主德國會防範中國在未來實施的

一切『區別對待』政策，我跟中國大使說了，民主德國永遠是蘇聯最親密的盟友。」^{①9}月，蘇聯官方又重拾猛烈攻擊中國的言論，標誌着塔什干路線已經在蘇共內部偃旗息鼓^{②0}。

就在蘇聯不斷警告東歐國家不要落入北京的反蘇圈套時，如前文所述，東德成功地在對華政策方面挑戰了蘇聯的權威，卻幾乎沒有遭受任何懲罰。垂垂老矣的勃列日涅夫訪問東柏林後三個月就病逝了，蘇聯政局隨即陷入長達兩年的不穩定狀態。1983年起擔任蘇聯駐東德大使的科奇馬索夫(Вячеслав И. Кочемасов)認為，此時的昂納克做事「沉着、主動、獨立，根本不看莫斯科的臉色」^{②1}。中國則對蘇聯潑過來的髒水不感興趣，對東歐各國完全擺出求同存異和向對方學習的姿態，其合作訴求主要在經濟方面。根據赫什伯格搜集到的材料，「1983年夏，一位中國外交官告訴他的匈牙利同事說，中國早已放棄了要匈牙利反對蘇聯的想法，也不想使其成為第二個南斯拉夫或羅馬尼亞」^{②2}。這顯示嚐到甜頭的東德為中國的區別對待政策帶來的宣傳效應，已經使對華國際變成了一個空架子。

從1983到1985年，對華國際依次在布拉格、匈牙利季哈尼(Tihany)和莫斯科召開了年會，在年會的間隔期還有一些級別低一些的討論會。然而，這三年的對華國際會議已經愈來愈像學術討論會。其中，東德代表在1983年12月的布拉格會議上依然多次扮演挑戰者的角色。羅滿寧在發言中稱中國正站在北約(NATO)一邊，而且對真正的中蘇關係正常化設置了嚴苛的前提條件；批評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雖略有提高，但其代價是不斷增大的社會不平等。馬洛則針鋒相對地指出：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已經相對穩定；中國對美國的批判有所增加；中國承認東歐諸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願意學習這些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最後，他坦率地承認中國與東德已經展開政治對話，並實現了「非正式工作接觸」。匈牙利社工黨附和了德國統社黨對局勢的判斷，但這兩個黨對會議報告草稿提出的修改意見大多都被大會否決了。匈牙利代表的報告還提到，「蘇共代表團不合作的態度，使得討論無法進行」^{②3}。布拉格會議最終的正式報告是一個妥協的產物，羅滿寧的主張、東德的部分意見、勃列日涅夫模稜兩可的對華態度都融匯於其中^{②4}。值得注意的是，波蘭統工黨沒有派出國際部的高級幹部，而僅僅派了一位波蘭科學院社會主義國家研究所的研究員參會，甚至給的經費還不充足^{②5}。這顯現了東歐各黨逐漸輕視對華國際的趨勢。

在匈牙利於1984年籌備對華國際第十四次會議時，羅滿寧事先給匈方打招呼，說會議要遵循「黨的路線」，沒有必要「讓學者摻合進來」；這樣的態度反而讓匈方察覺「關於中國問題，蘇聯內部有爭議」。會議於10月底正式開幕後，鑒於里根政府強硬的對華政策，蘇東各國普遍認為應該讓中國加入到對帝國主義的戰鬥中來。對華國際成員國當中堅決反華的只有越南，就連羅滿寧也認為：將越南的利益納入考慮也是重要的，但不可能讓所有問題都從屬越南問題^{②6}。越南代表認為現在還不存在與中國恢復直接接觸的條件，並建議在會議報告中，不要用「積極」(positive)一詞來形容中國與一些社會主義國

家的關係取得的進展；還建議將描述中國國內發展成就的形容詞由「巨大」(enormous)改為「一些」(some)。在經過激烈爭論後，越南的這些要求通通都被大會否決。反而是德國統社黨的約二十條修改意見在經過調整後被大會編輯委員會接受^⑥。

然而，比各國代表團意見更加重要的事實是，對華國際在他們眼中的重要性正在進一步下降。東德已經沒有興趣在此與蘇聯爭論，反而「反覆聲明同意蘇共的看法，吹捧羅滿寧個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在暗自推進行對華關係，以至於前者甚至嫉妒後者在經貿、文化交流等領域悄無聲息地走得更遠。按照匈牙利代表的觀察，對華國際會議討論中的「具體資訊價值一直在下降，這一點從今年沒有任何代表團交出相關背景材料就可以看出。一些代表團所作的發言實際上不過是些花言巧語，而且其宣言往往與自己實際採取的步驟相矛盾」^⑦。在對華國際存在的最後幾年時間裏，波蘭統工黨國際部領導人的總結最能反映東歐國家的態度：「就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而言，我們不應該（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競賽』。脖子伸得太長，下場或許不妙。我們應該遵循我們國家的最大利益。」^⑧

1984年12月，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Иван В. Архипов)訪問北京，阿氏曾於1950年代作為蘇聯駐華總顧問帶領蘇聯專家援華，如今再次與昔日「老朋友」陳雲、薄一波、彭真等人見面，竟至相擁而泣。這次會面雖未解決「三大障礙」的問題，但也簽署了三項中蘇之間的經貿、科技協定。其後中方突破十多年來的禁忌，再次稱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這些都給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帶來新的希望^⑨。

為了阻擋中蘇關係正常化這一趨勢，羅滿寧將原定在1985年10月於莫斯科舉行的對華國際第十五次會議提前到2月18日召開。羅滿寧在會議上批評了阿爾希波夫在北京的會談結果，繼續否定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他認為中國的戰略訴求在客觀上和美帝國主義有吻合之處，即削弱蘇聯並實現地緣政治野心；中國的內政正在導致資本主義捲土重來。對此，他提議對華國際各成員國應該繼續反擊中國的區別對待政策；在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時謹慎地確定範圍和品質，避免增強中國的軍事潛力；注意抵制北京的所謂「人民外交」：「我們要反對中國將經濟、文化、科學、社會及其他問題與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分開來談的企圖。」^⑩由羅滿寧代表蘇共中央下達的這些提議究竟有多大效果呢？主要是讓那些尚畏懼蘇聯的國家不敢說話，比如波蘭統工黨國際部認為：「應指示我們的經濟代表團不要做任何政治評論，因為任何政治評論都有可能被認為是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中國政策……」但除此之外，統工黨仍在羅滿寧講話的縫隙中尋找進一步與中國發展關係的機會，比如在貿易領域——當時蘇聯已經准許東歐各國與中國進行經貿方面的接觸，只是明確表示要注意政治原則^⑪。

1986年6月21日，羅滿寧再次在《真理報》上發文批評東歐國家在對華政策上陽奉陰違，表現出「秘密的甚或是公開的恐俄症和反蘇主義」。然而，東歐國家紛紛改變對華政策的事實早為蘇共中央內部的務實派所默認，他們勸

說新上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Михайл С. Горбачёв)重新評估羅滿寧在對華政策上的論據，其中一些早就對羅滿寧那一套理論不滿的年青官員成為了戈氏的心腹顧問。此時國內經濟蕭條，財政負擔沉重，加上里根政府步步緊逼，戈氏已決心讓蘇聯收縮戰線，同時銳意改革，因此欲推進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以改善蘇聯的戰略處境。於是，羅滿寧這篇帶着中蘇論戰時代氣息的文章一下子觸怒了戈爾巴喬夫，導致羅滿寧被迫退休，原定於10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對華國際第十六次會議再也沒有舉行，存在了十九年的對華國際無疾而終^⑩。

四 結語

對華國際是一個較為鬆散的組織，卻給中國外交造成巨大的壓力，它在中蘇關係最緊張的時代鞏固了以蘇聯為核心的反華同盟，構成了該集團的信息傳導體系。通過對華國際，蘇共的反華政策既提升了理論高度，又增加了可執行的細節，使整個集團能統一口徑和步調，共同打擊中國並抵制中國對蘇東國家的區別對待政策。從實際效果看，中國的區別對待政策在1978年前確實沒有取得突破。然而在1980年代初，中國先是在東德身上打開了缺口，繼而瓦解了對華國際的凝聚力，那麼中國能挫敗對華國際的原因究竟是甚麼？

從上文所敘史實，似可找到三個因素：第一，中國在國家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上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東歐諸國最擔心的就是中國在與自己的交往中將中蘇論戰裏的觀點引入本國，故意或是客觀上製造出黨內的反對派，從而威脅整個國家的穩定。從19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國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都被稱為區別對待政策，1978年後中國對東歐外交政策的突出特點就是謙遜化和務實化：不強求東歐國家加入反蘇統一戰線，主要是為改革開放盡可能爭取友好的國際環境；在各層級的接觸中，中方非但不勸說對方向中國學習，反而坦率承認中國在發展道路上出現過失誤。其思想根源來自於中國在文革結束後堅持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中心的改革。儘管東德等國在最開始的兩年間未能明確識別中國發生的根本性轉變，但在1979年後逐漸發現中國確實在走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路。它們認識到，儘管中國與蘇聯之間的矛盾或許還會存在一個時期，但中國與自己的合作將不再有較大的障礙，從而不再相信羅滿寧等蘇共理論家所言的中國在繼續執行反蘇路線。

第二，中國的改革開放為蘇東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機會。1970年代初由石油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給東歐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依靠出口的工業國尤盼能在世界市場上佔到一席之地。但在1970年代末，這些東歐國家的生產水平與西方國家進一步拉大，產品滯銷嚴重，而中國這個新興市場帶來了大量的機會——這是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最大吸引力。中國在兩國互動中的配合，讓東德由「心動」步步轉為「行動」。其實，早在1960年代初中蘇論戰時，東德就一直想與中國在發生意識形

態爭吵的同時保持國家間的正常關係，並進行過試探，但那時的中國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態度，當時中國外事人員既不區分黨際與國際關係，也無法想像兩國可以在一些議題上敵對和競爭，而在另外一些議題上保持交流與合作。故而中國駐東德大使館發報回國稱，東德的對華態度雖有改善，但這些「變化仍係表面的、策略性的，在實質問題上德方基本立場未變」，「表面上對我尚友好，但骨子裏是冷的」，其實質是「實用主義，力圖在貿易上撈油水」；所以，中方的政策應該是「政治上熱一些，經濟上冷一些……不讓德方在政治上反我，經濟上仍可佔我便宜」^①。時過境遷，當1979年東德政府再次進行試探時，中方欣然會意，雙邊關係遂快速升溫。

第三，東德能在對華國際的瓦解過程中扮演特殊角色，是因為其國家利益與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發展戰略的深度契合。蘇聯的保護、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聲望的提高，是東德維護其政權穩定的三根支柱。1980年後的數年內，蘇聯深陷阿富汗困局，垂垂老矣的勃列日涅夫對東歐的控制已力不從心，對華政策也出現內部分歧，因而難以對於東德在對華政策方面的自作主張施以懲戒。同時，實現同中國的貿易、科技和文化合作又對東德的國民經濟和國際聲望有巨大好處，於是東德的黨和政府作出了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選擇。

此外，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客觀上增大了與中國交好的利益。就東德而言，加強與中國這個大國的關係不但能夠鞏固自身與西方國家交往時的立場，同時也將增加東德在面對蘇聯時的底氣^②。即使是主導對華國際的蘇聯，也不能完全忽視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巨大利益，並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在國家戰略中的位置。

中國自身其實並沒有一個瓦解對華國際的具體計劃，1978至1986年間中國反蘇事業的重點在中國周邊，而且中國領導人基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更看重中美關係，對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也並不著急。中國與東德接觸的主要動機是為改革開放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而不是為了藉此改善中蘇關係。雖未必沒有以此孤立蘇聯的想法，卻也不抱太大希望，因為直到1985年末，中國外交部內部的主流看法仍是東歐諸國的自主性有限，「蘇聯和東歐之間只能說是存在差異，談不上傾向」^③。而大大超乎中方意料的是，東德政府在多次互動中確認了中方新政策的務實性之後，在對華政策方面顯現出空前的自主性。東德在對華國際內部對蘇聯的權威提出挑戰，既鼓舞了其他東歐國家開展獨立自主的對華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蘇聯重新權衡對華政策的壓力，從而使對華國際喪失其原有功能並最終瓦解。

註釋

①② James Hershberg et al., "The Interkit Story: A Window into the Final Decades of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63 (February 2011), 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publication/Working_Paper_63.pdf, 3; 8-10.

- ② James Hershberg et al., "The Interkit Story", 1-144. 該文已被譯成中文，參見赫什伯格 (James Hershberg) 等著，馮瓊媛譯：〈對華國際真相：揭開中蘇關係最後階段的史實〉，《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2輯 (2011年12月)，頁1-31。該刊同一期還譯有一些與對華國際相關的檔案，參見赫什伯格等選編，羅曦譯：〈蘇聯集團國家有關中國和對華國際文件節選 (1966-1987)〉，頁283-365。
- ③ Balázs Szalontai, "Solidarity within Limits: Interki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Bloc's Indochina Policy, 1967-1985", *Cold War History* 17, no. 4 (2017): 385-403.
- ④ 馬細譜：〈中國與東歐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蘇聯因素——以「對華國際」活動為例〉，《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4期，頁83-88。
- ⑤⑯ David Wolff, "Interkit: Soviet Sinology and the Sino-Soviet Rift",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30, no. 4 (2003): 434; 448-49.
- ⑥ 沈志華：〈導言〉，載沈志華主編：《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蘇東九國解密檔案選編》(未刊稿)。
- ⑦⑭ 羅曦譯：〈沃什關於對華國際經濟會議的報告：對中國的經濟政策〉(1980年11月10日)，載《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
- ⑧⑮ 舍費爾 (Bernd Schaefer) 著，馮瓊媛譯：〈「對華國際時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2輯，頁91-102；100-101。
- ⑨ Zhong Zhong Chen, "Defying Moscow: East German-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Andropov-Chernenko Interregnum, 1982-1985", *Cold War History* 14, no. 2 (2014): 259-80.
- ⑩ 2012年10月18至19日，中國科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了一次關於中國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見〈「新史料·新發現：中國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 (1949-1989)」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2012年11月22日)，中國世界史研究網，http://iwh.cssn.cn/zdxx/201211/t20121122_5223294.shtml。
- ⑪ 牛軍：〈從「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國對「東歐五國」政策〉，《外交評論》，2013年第5期，頁65-82。
- ⑫ 關於中國對東歐國家的既往政策，參見李丹慧：〈關於1960年代中國與東歐五國關係的若干問題——來自中國檔案文獻的新證據〉，《俄羅斯研究》，2011年第4期，頁105-28；〈分朋引類：中國分化蘇聯東歐集團再探討 (1964-1965)〉，《冷戰國際史研究》，第22輯 (2016年12月)，頁55-84。在一些當代中國外交史和中德關係史的專著中，對這個領域也有所提及。比如在王泰平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中的相關章節內，也曾簡要介紹這段時間內中國與東德交往的一些重大事件，但談不上分析研究。參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82-357。
- ⑬ Werner Meißner, ed.,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 ⑭ Claudie Gardet, *Les relation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1949-1989)* (Bern: Peter Lang, 2000).
- ⑮ Joachim Krüger, "Die Parteiinternen China-Informationen der SED-Führung 1969-1988",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ed. Joachim Krüge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163-69.
-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㡧㡨㡩㡪㡫㡬㡭㡮㡯㡰㡱㡲㡳㡴㡵㡶㡷㡸㡹㡺㡻㡼㡽㡾㡿㢀㢁㢂㢃㢄㢅㢆㢇㢈㢉㢊㢋㢌㢍㢎㢏㢐㢑㢒㢓㢔㢕㢖㢗㢘㢙㢚㢛㢜㢝㢞㢟㢠㢡㢢㢣㢤㢥㢦㢧㢨㢩㢪㢫㢬㢭㢮㢯㢰㢱㢲㢳㢴㢵㢶㢷㢸㢹㢺㢻㢼㢽㢾㢿㣀㣁㣂㣃㣄㣅㣆㣇㣈㣉㣊㣋㣌㣍㣎㣏㣐㣑㣒㣓㣔㣕㣖㣗㣘㣙㣚㣛㣜㣝㣞㣟㣠㣡㣢㣣㣤㣥㣦㣧㣨㣩㣪㣫㣬㣭㣮㣯㣰㣱㣲㣳㣴㣵㣶㣷㣸㣹㣺㣻㣼㣽㣾㣿㤀㤁㤂㤃㤄㤅㤆㤇㤈㤉㤊㤋㤌㤍㤎㤏㤐㤑㤒㤓㤔㤕㤖㤗㤘㤙㤚㤛㤜㤝㤞㤟㤠㤡㤢㤣㤤㤥㤦㤧㤨㤩㤪㤫㤬㤭㤮㤯㤰㤱㤲㤳㤴㤵㤶㤷㤸㤹㤺㤻㤼㤽㤾㤿㥀㥁㥂㥃㥄㥅㥆㥇㥈㥉㥊㥋㥌㥍㥎㥏㥐㥑㥒㥓㥔㥕㥖㥗㥘㥙㥚㥛㥜㥝㥞㥟㥠㥡㥢㥣㥤㥥㥦㥧㥨㥩㥪㥫㥬㥭㥮㥯㥰㥱㥲㥳㥴㥵㥶㥷㥸㥹㥺㥻㥼㥽㥾㥿㦀㦁㦂㦃㦄㦅㦆㦇㦈㦉㦊㦋㦌㦍㦎㦏㦐㦑㦒㦓㦔㦕㦖㦗㦘㦙㦚㦛㦜㦝㦞㦟㦠㦡㦢㦣㦤㦥㦦㦧㦨㦩㦪㦫㦬㦭㦮㦯㦰㦱㦲㦳㦴㦵㦶㦷㦸㦹㦺㦻㦼㦽㦾㦿㧀㧁㧂㧃㧄㧅㧆㧇㧈㧉㧊㧋㧌㧍㧎㧏㧐㧑㧒㧓㧔㧕㧖㧗㧘㧙㧚㧛㧜㧝㧞㧟㧠㧡㧢㧣㧤㧥㧦㧧㧨㧩㧪㧫㧬㧭㧮㧯㧰㧱㧲㧳㧴㧵㧶㧷㧸㧹㧺㧻㧼㧽㧾㧿㨀㨁㨂㨃㨄㨅㨆㨇㨈㨉㨊㨋㨌㨍㨎㨏㨐㨑㨒㨓㨔㨕㨖㨗㨘㨙㨚㨛㨜㨝㨞㨟㨠㨡㨢㨣㨤㨥㨦㨧㨨㨩㨪㨫㨬㨭㨮㨯㨰㨱㨲㨳㨴㨵㨶㨷㨸㨹㨺㨻㨼㨽㨾㨿㩀㩁㩂㩃㩄㩅㩆㩇㩈㩉㩊㩋㩌㩍㩎㩏㩐㩑㩒㩓㩔㩕㩖㩗㩘㩙㩚㩛㩜㩝㩞㩟㩠㩡㩢㩣㩤㩥㩦㩧㩨㩩㩪㩫㩬㩭㩮㩯㩰㩱㩲㩳㩴㩵㩶㩷㩸㩹㩺㩻㩼㩽㩾㩿㪀㪁㪂㪃㪄㪅㪆㪇㪈㪉㪊㪋㪌㪍㪎㪏㪐㪑㪒㪓㪔㪕㪖㪗㪘㪙㪚㪛㪜㪝㪞㪟㪠㪡㪢㪣㪤㪥㪦㪧㪨㪩㪪㪫㪬㪭㪮㪯㪰㪱㪲㪳㪴㪵㪶㪷㪸㪹㪺㪻㪼㪽㪾㪿㫀㫁㫂㫃㫄㫅㫆㫇㫈㫉㫊㫋㫌㫍㫎㫏㫐㫑㫒㫓㫔㫕㫖㫗㫘㫙㫚㫛㫜㫝㫞㫟㫠㫡㫢㫣㫤㫥㫦㫧㫨㫩㫪㫫㫬㫭㫮㫯㫰㫱㫲㫳㫴㫵㫶㫷㫸㫹㫺㫻㫼㫽㫾㫿㬀㬁㬂㬃㬄㬅㬆㬇㬈㬉㬊㬋㬌㬍㬎㬏㬐㬑㬒㬓㬔㬕㬖㬗㬘㬙㬚㬛㬜㬝㬞㬟㬠㬡㬢㬣㬤㬥㬦㬧㬨㬩㬪㬫㬬㬭㬮㬯㬰㬱㬲㬳㬴㬵㬶㬷㬸㬹㬺㬻㬼㬽㬾㬿㭀㭁㭂㭃㭄㭅㭆㭇㭈㭉㭊㭋㭌㭍㭎㭏㭐㭑㭒㭓㭔㭕㭖㭗㭘㭙㭚㭛㭜㭝㭞㭟㭠㭡㭢㭣㭤㭥㭦㭧㭨㭩㭪㭫㭬㭭㭮㭯㭰㭱㭲㭳㭴㭵㭶㭷㭸㭹㭺㭻㭼㭽㭾㭿㮀㮁㮂㮃㮄㮅㮆㮇㮈㮉㮊㮋㮌㮍㮎㮏㮐㮑㮒㮓㮔㮕㮖㮗㮘㮙㮚㮛㮜㮝㮞㮟㮠㮡㮢㮣㮤㮥㮦㮧㮨㮩㮪㮫㮬㮭㮮㮯㮰㮱㮲㮳㮴㮵㮶㮷㮸㮹㮺㮻㮼㮽㮾㮿㯀㯁㯂㯃㯄㯅㯆㯇㯈㯉㯊㯋㯌㯍㯎㯏㯐㯑㯒㯓㯔㯕㯖㯗㯘㯙㯚㯛㯜㯝㯞㯟㯠㯡㯢㯣㯤㯥㯦㯧㯨㯩㯪㯫㯬㯭㯮㯯㯰㯱㯲㯳㯴㯵㯶㯷㯸㯹㯺㯻㯼㯽㯾㯿㰀㰁㰂㰃㰄㰅㰆㰇㰈㰉㰊㰋㰌㰍㰎㰏㰐㰑㰒㰓㰔㰕㰖㰗㰘㰙㰚㰛㰜㰝㰞㰟㰠㰡㰢㰣㰤㰥㰦㰧㰨㰩㰪㰫㰬㰭㰮㰯㰰㰱㰲㰳㰴㰵㰶㰷㰸㰹㰺㰻㰼㰽㰾㰿㱀㱁㱂㱃㱄㱅㱆㱇㱈㱉㱊㱋㱌㱍㱎㱏㱐㱑㱒㱓㱔㱕㱖㱗㱘㱙㱚㱛㱜㱝㱞㱟㱠㱡㱢㱣㱤㱥㱦㱧㱨㱩㱪㱫㱬㱭㱮㱯㱰㱱㱲㱳㱴㱵㱶㱷㱸㱹㱺㱻㱼㱽㱾㱿㲀㲁㲂㲃㲄㲅㲆㲇㲈㲉㲊㲋㲌㲍㲎㲏㲐㲑㲒㲓㲔㲕㲖㲗㲘㲙㲚㲛㲜㲝㲞㲟㲠㲡㲢㲣㲤㲥㲦㲧㲨㲩㲪㲫㲬㲭㲮㲯㲰㲱㲲㲳㲴㲵㲶㲷㲸㲹㲺㲻㲼㲽㲾㲿㳀㳁㳂㳃㳄㳅㳆㳇㳈㳉㳊㳋㳌㳍㳎㳏㳐㳑㳒㳓㳔㳕㳖㳗㳘㳙㳚㳛㳜㳝㳞㳟㳠㳡㳢㳣㳤㳥㳦㳧㳨㳩㳪㳫㳬㳭㳮㳯㳰㳱㳲㳳㳴㳵㳶㳷㳸㳹㳺㳻㳼㳽㳾㳿㴀㴁㴂㴃㴄㴅㴆㴇㴈㴉㴊㴋㴌㴍㴎㴏㴐㴑㴒㴓㴔㴕㴖㴗㴘㴙㴚㴛㴜㴝㴞㴟㴠㴡㴢㴣㴤㴥㴦㴧㴨㴩㴪㴫㴬㴭㴮㴯㴰㴱㴲㴳㴴㴵㴶㴷㴸㴹㴺㴻㴼㴽㴾㴿㵀㵁㵂㵃㵄㵅㵆㵇㵈㵉㵊㵋㵌㵍㵎㵏㵐㵑㵒㵓㵔㵕㵖㵗㵘㵙㵚㵛㵜㵝㵞㵟㵠㵡㵢㵣㵤㵥㵦㵧㵨㵩㵪㵫㵬㵭㵮㵯㵰㵱㵲㵳㵴㵵㵶㵷㵸㵹㵺㵻㵼㵽㵾㵿㶀㶁㶂㶃㶄㶅㶆㶇㶈㶉㶊㶋㶌㶍㶎㶏㶐㶑㶒㶓㶔㶕㶖㶗㶘㶙㶚㶛㶜㶝㶞㶟㶠㶡㶢㶣㶤㶥㶦㶧㶨㶩㶪㶫㶬㶭㶮㶯㶰㶱㶲㶳㶴㶵㶶㶷㶸㶹㶺㶻㶼㶽㶾㶿㷀㷁㷂㷃㷄㷅㷆㷇㷈㷉㷊㷋㷌㷍㷎㷏㷐㷑㷒㷓㷔㷕㷖㷗㷘㷙㷚㷛㷜㷝㷞㷟㷠㷡㷢㷣㷤㷥㷦㷧㷨㷩㷪㷫㷬㷭㷮㷯㷰㷱㷲㷳㷴㷵㷶㷷㷸㷹㷺㷻㷼㷽㷾㷿㸀㸁㸂㸃㸄㸅㸆㸇㸈㸉㸊㸋㸌㸍㸎㸏㸐㸑㸒㸓㸔㸕㸖㸗㸘㸙㸚㸛㸜㸝㸞㸟㸠㸡㸢㸣㸤㸥㸦㸧㸨㸩㸪㸫㸬㸭㸮㸯㸰㸱㸲㸳㸴㸵㸶㸷㸸㸹㸺㸻㸼㸽㸾㸿㹀㹁㹂㹃㹄㹅㹆㹇㹈㹉㹊㹋㹌㹍㹎㹏㹐㹑㹒㹓㹔㹕㹖㹗㹘㹙㹚㹛㹜㹝㹞㹟㹠㹡㹢㹣㹤㹥㹦㹧㹨㹩㹪㹫㹬㹭㹮㹯㹰㹱㹲㹳㹴㹵㹶㹷㹸㹹㹺㹻㹼㹽㹾㹿㺀㺁㺂㺃㺄㺅㺆㺇㺈㺉㺊㺋㺌㺍㺎㺏㺐㺑㺒㺓㺔㺕㺖㺗㺘㺙㺚㺛㺜㺝㺞㺟㺠㺡㺢㺣㺤㺥㺦㺧㺨㺩㺪㺫㺬㺭㺮㺯㺰㺱㺲㺳㺴㺵㺶㺷㺸㺹㺺㺻㺼㺽㺾㺿㻀㻁㻂㻃㻄㻅㻆㻇㻈㻉㻊㻋㻌㻍㻎㻏㻐㻑㻒㻓㻔㻕㻖㻗㻘㻙㻚㻛㻜㻝㻞㻟㻠㻡㻢㻣㻤㻥㻦㻧㻨㻩㻪㻫㻬㻭㻮㻯㻰㻱㻲㻳㻴㻵㻶㻷㻸㻹㻺㻻㻼㻽㻾㻿㼀㼁㼂㼃㼄㼅㼆㼇㼈㼉㼊㼋㼌㼍㼎㼏㼐㼑㼒㼓㼔㼕㼖㼗㼘㼙㼚㼛㼜㼝㼞㼟㼠㼡㼢㼣㼤㼥㼦㼧㼨㼩㼪㼫㼬㼭㼮㼯㼰㼱㼲㼳㼴㼵㼶㼷㼸㼹㼺㼻㼼㼽㼾㼿㽀㽁㽂㽃㽄㽅㽆㽇㽈㽉㽊㽋㽌㽍㽎㽏㽐㽑㽒㽓㽔㽕㽖㽗㽘㽙㽚㽛㽜㽝㽞㽟㽠㽡㽢㽣㽤㽥㽦㽧㽨㽩㽪㽫㽬㽭㽮㽯㽰㽱㽲㽳㽴㽵㽶㽷㽸㽹㽺㽻㽼㽽㽾㽿㿀㿁㿂㿃㿄㿅㿆㿇㿈㿉㿊㿋㿌㿍㿎㿏㿐㿑㿒㿓㿔㿕㿖㿗㿘㿙㿚㿛㿜㿝㿞㿟㿠㿡㿢㿣㿤㿥㿦㿧㿨㿩㿪㿫㿬㿭㿮㿯㿰㿱㿲㿳㿴㿵㿶㿷㿸㿹㿺㿻㿼㿽㿾㿿

pdf, 1-291. 此外，該文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判斷上，似乎未能吸收冷戰國際史學界近些年來的成果，比如在中蘇分裂一事上，依然毫無辨析地停留在「中蘇兩國的分歧因蘇共二十大而起」的舊判斷中。關於中蘇分歧並非因蘇共二十大而起的最新分析，參見葛君：〈蘇共二十大後中共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影響探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22年12月號，頁72-89。

⑱ 羅曦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報告：莫斯科對華國際會議情況〉（1967年12月27日），載《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

⑲ 〈鄧小平會見黑根談話錄〉（1964年1月1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3919-03；〈駐德使館致外交部電〉（1963年7月2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2574-02。

⑳ “East German Report on Interkit Meeting in Moscow” (May 1973), trans. Bernd Schaefer, in James Hershberg et al., “The Interkit Story”, 88-89.

㉑ 中文裏的「備戰備荒」給人的感覺是防禦性的，而翻譯成外文之後的「準備戰爭」給人的印象則是侵略性的。「備戰備荒」最初是周恩來進行的總結，1966年3月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信中詳細解釋過。1967年4月，「備戰、備荒、為人民」作為「毛主席語錄」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很快盡人皆知，乃至作為標語被刷在牆上。參見廖述江：〈「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由來和歷史演變〉，《黨史文苑》，2006年第13期，頁39-43。此外，容易讓蘇聯方面產生緊張情緒的還有毛澤東在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召開時發表的講話：「就是要準備打仗。無論哪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參見牛軍：《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頁451。

㉒ “Übersetzung [aus Russisch]” (16 September 1971),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SAPMO-BArch), DY 30/13929, Bl. 7. 這份檔案上還有昂納克的親筆批示：「政治局傳閱，EH〔昂納克〕，1971年9月17日」，反映這份檔案可能是「九一三事件」後蘇聯發給對華國際成員國的情況通報。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提到的敵人中也包括「改良主義者」（Reformisten）。

㉓ Joachim Krüger, “Die Parteiinternen China-Informationen der SED-Führung 1969-1988”, 166. 《情報》是德國統社黨於1968年5月到1989年間編寫的黨內宣傳小冊子，一共出版了261期，發行量約為十萬，一直下發到基層黨組織，所以可以看成是全黨的組織生活學習材料。

㉔ 李丹慧：〈關於1960年代中國與東歐五國關係的若干問題〉，頁126-28；〈分朋引類〉，頁84。

㉕ 李丹慧：〈關於1960年代中國與東歐五國關係的若干問題〉，頁127。

㉖ 例如〈一些德匈朋友熱愛偉大導師毛主席〉，《參考消息》，1968年10月22日；〈波蘭人民稱頌毛主席是救星〉，《參考消息》，1969年7月26日。

㉗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Jahresbericht zur Arbeit mit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der VR China, Peking, den 12. 10. 1983”,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39.

㉘ “Zu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RD und der VR China” (27 Oktober 1978), SAPMO-BArch, DY 30/13930, Bl. 166-68.

㉙ 一個明顯的事例是：1978年2月至6月，東德派柏林洪堡大學亞洲學部的青年研究員安悟行（Wolfram Adolphi）前往北京學習中文。安悟行出生於1951年，從1971年開始學習國際關係，1976年開始學習中文。而安悟行的另一個身份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的「非正式工作人員」（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 [IM]），他需要定期匯報關於中國發展和對外交往的最新情報。其主要關注點是外國（特別是西德）與中國進行文化交流的人員，並盡可能與之建立私人聯繫。其訪談參見“‘Ich war für alle eine kleine Sensation’ . Interview mit Wolfram Adolphi, Journalist und Politikwissenschaftler, 1978 und 1987/88 im Rahmen eines Studien- bzw. Forschungsaufenthalts in der VR China” (17 Mai 2013), in Marcel Bode, “Die Beziehung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gegenüber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n Jahren 1978 bis 1990”, 1-4。

⑳ “Meinungsäußerungen von Mitarbeitern der Botschaft der VR China in der DDR zu einigen aktuell-politischen Fragen”, 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BStU),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 HA XX/AKG Nr. 5338. 凡引用德文檔案未列頁碼者，皆因其本身沒有頁碼，也沒有任何編碼。

㉑ “Information, Äußerungen und Meinungen des Mitarbeiters der Botschaft der VR China in der DDR zu aktuellen politischen Fragen”, BStU, MfS, HA XX Nr. 6248.

㉒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verstärkten das Gewicht der DDR im internationalen Geschehen. Interview mit Hans Modrow, ehemaliger Ministerpräsident der DDR” (7 Juni 2013), in Marcel Bode, “Die Beziehung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gegenüber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n Jahren 1978 bis 1990”, 2-3.

㉓㉔ Yu Ning, *Die Chinapolitik der DDR in den 1980er-Jahren*, 88-90; 114-15.

㉕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40-53。

㉖ “Zum 3. Plenum des ZK der KP Chinas” (28 Dezember 1978), SAPMO-BArch, DY 30/17809.

㉗ 筆者嘗試總結東德花了幾年時間才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國策的原因：其一，中國的改革開放本來就是一個「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1976至1982年間中共黨內的共識也經歷了逐步統一的過程；其二，蘇聯灌輸的「(毛主義)中國觀」構成了東德觀察中國的刻板印象；其三，蘇聯出於自身利益，一直通過對華國際等手段干預東歐國家的對華政策，而東德等國因其與蘇聯的特殊關係而不得受制於蘇聯；其四，雙方在思考和表達方式上有差異：由於德方一直存在「非此即彼」的邏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理解為甚麼允許毛澤東曾明言反對的「包產到戶」落實，也是在「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參見童欣：〈民主德國政府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認知過程〉（未刊稿）。

㉘ “‘Die Entwicklung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gegenüber China war in erster Linie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Interview mit Rolf Berthold, Botschafter der DDR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von 1982 bis 1990” (3 Juni 2013), in Marcel Bode, “Die Beziehung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gegenüber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n Jahren 1978 bis 1990”,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訪談中，提問者問的和貝特霍爾德說的，都是德方對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的反應。但是，鄧小平的講話其實發生在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而且這篇講話在1982年前從未公開發布，僅存於內部檔案之中，當時公開發布的只有三中全會公報。所以，要麼是德方情報機構獲得了內部檔案，要麼是年事已高的貝特霍爾德因提問者不夠準確的表述而混淆了記憶。

㉙ 〈朱其文大使向黨委匯報紀要〉（1962年5月2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2395-01。

㉚㉛㉜ 赫什伯格等：〈對華國際真相〉，頁25；26；29；31。

㉝ 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年譜》，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58。

㉞ “Telegramm des Botschafters Liebermann” (24 März 1982),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56.

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7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263。

㊱㊲ 蔣華杰：〈從「懸擱」到「重啟」——中國東南亞安全戰略視角下的中馬關係演變（1978-1989）〉，《國際政治研究》，2021年第5期，頁148、154；130-60。

㊳ 關於中國深度介入安哥拉內戰的情況，參見田金宗：〈冷戰視野下的安哥拉內戰（1974-1988）〉（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文安立（Odd A. Westad）著，牛可等譯：《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與當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世界

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221-32。關於1978年後中國援助非洲政策的轉變，參見蔣華杰：〈現代化、國家安全與對外援助——中國援非政策演變再思考（1970-1983）〉，《外交評論》，2019年第6期，頁121-54（李先念的話參見頁147）。關於中國外交政策務實化在歐洲的表現，中國削減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參見蔣華杰：〈現代化、國家安全與對外援助〉，頁132-33。

⑥⑨ “Aufenthalt von 2 Mitarbeitern des ZK der KP Chinas in der DDR” (16 Juli-23 August 1981),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53-54.

⑦⑩ “Innenpolitische Lage in China nach der 2. Tagung des V. Nationalen Volkskongresses” (3 August 1979), “Innen- und außenpolitische Aspekte der 2. Tagung des V. nationalen Volkskongresse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6 Juli 1979), “Kulturpolitik der chinesischen Führer” (14 August 1979), SAPMO-BArch, DY 30/17809.

⑧⑪ 羅曦譯：〈關於第十一次對華國際會議的報告：協調各國對華政策〉，載《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

⑫ “Beziehungen China-BRD 1978/79”, SAPMO-BArch, DY 30/17809.

⑬ 董欣、楊琪譯：〈關於同蘇共中央候補委員、國際部第一副部長羅滿寧同志的談話〉（1980年6月10日），載《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

⑭ 蘇聯有所謂的中國研究「四巨頭」（或被戲稱為「四人幫」），除了羅滿寧外，還有影響蘇聯外交部對華政策的賈丕才（Михаил С. Кáпица，歷任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1970-1982〕、外交部副部長〔1982-1987〕）、先後主導外貿部和學術界對華工作的斯拉德科夫斯基（Михаил И. Сладкóвский，1965年以前在外貿部工作，1966至1985年任遠東研究所所長）、任職於蘇聯外交協會並負責培訓新的外交官的齊赫文（Сергей Л. Тихвинский）。其中，羅滿寧和斯拉德科夫斯基對於對華國際的影響力較大。參見David Wolff, “Interkit: Soviet Sinology and the Sino-Soviet Rift”, 446-47。

⑮ “Bericht über den Zwischenaufenthalt einer Delegation der Abteilung Internationale Verbindungen des ZK der SED an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12-16 Mai 1981),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53-54.

⑯ “Telegramm des Botschafters Liebermann”, 356. 「中國對美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抱任何幻想」這句引文被檔案的閱讀者重點標記過，編者在檔案集出版時有所提及。

⑰ 葛君譯：〈情報〉（1982年6月22日），載《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

⑱ 吳躍農：〈從「塔什干講話」到「海參崴講話」——中蘇關係正常化歷程（上）〉，《黨史縱覽》，2011年第8期，頁22-23。

⑲ “Niederschrift über das Gespräch des Generalsekretärs des ZK der KP Chinas, Genossen HuYaobang, mit Genossen Gerhard Schürer am 10. 7. 1985 im Sitz der Partei- und Staatsführung der VR China, Zhongnanhai”,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65.

⑳ “Niederschrift über eine Begegnung des Generalsekretärs des ZK der SED und Vorsitzenden des Staatsrates der DDR, Genossen Erich Honecker, mit dem Vorsitzenden der Zentralen Beraterkommission der KP Chinas, Genossen Deng Xiaoping, am 23. 10. 1986 im Gebäude des NVK der VR China”,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77.

㉑ “Niederschrift über das Gespräch des Gnessen Erich Honecker, Generalsekritär des ZK der SED, mit Genossen Hu Yaobang, Generalsekretär des ZK der KP Chinas, am 22. 10. 1986”,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369-70.

㉒ “Wunsch nach steter Entwicklung von Wirtschafts- und Handels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m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294.

㉓㉔㉕ “Entries from Diary of CPSU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ficial Anatoly Chernyaev Regarding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Summer and Fall 1982”,

trans. Sergey Radchenko,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309>.

⑲ 楊琪譯：〈對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代表團出席1982年5月11-12日在索菲亞召開的第十二屆對華國際會議的指示〉（1982年5月3日），載《冷戰年代的中國與東歐》。

⑳㉑ 〈蘇共中央國際部官員阿納托利·切爾尼亞有關蘇聯對華政策的日記摘錄〉（1982年5月21日），載〈蘇聯集團國家有關中國和對華國際文件節選（1966-1987）〉，頁348-53；359。

㉒ 〈匈牙利駐莫斯科大使關於同蘇聯中國問題專家羅滿寧談話的電報〉（1982年7月7日），載〈蘇聯集團國家有關中國和對華國際文件節選（1966-1987）〉，頁348。

㉓ “Cable from Géza Kótai, ‘Report on the China Consultation of C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s of Fraternal Parties of Ten Socialist Countries’” (14 December 1983), trans. Katalin Varg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43>.

㉔ “Cable from Géza Kótai, ‘Protocol of the China-Consulta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C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s of the Ten Fraternal Parties Held on 6-7 December 1983 in Prague’” (27 December 1983), trans. Katalin Varg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44>.

㉕ “Note from Slawinski to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CC PUWP” (18 December 1983), trans. Malgorzata K. Gnoinsk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410>.

㉖ Iván Németh, “Memorandum for the Attention of Comrade Mátyás Szűrös” (15 October 1984), trans. Katalin Varg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45>.

㉗㉘ Iván Németh, “Report for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Committee on the China Consultation Held in Tihany (Interkit)” (6 November 1984), trans. Katalin Varg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9347>.

㉙ “Speech Excerpt from Meeting of CC PUWP Department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Sino-Polish Relations” (27 August 1985), trans. Malgorzata K. Gnoinsk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220>.

㉚ 〈「友好 惡化 敵對 緩和」 看中蘇關係40年變遷〉（2008年1月19日），鳳凰資訊網，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200801/0119_335_370952_6.shtml。

㉛ 〈波蘭關於莫斯科對華國際會議的報告〉（1985年2月），載〈蘇聯集團國家有關中國和對華國際文件節選（1966-1987）〉，頁360。

㉜ “Note from a Working Meeting of the C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Deputy Heads of Fraternal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18 February 1985), trans. Malgorzata K. Gnoinska,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221>.

㉝ 〈駐德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1962年8月1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2427-01；〈駐德使館致外交部電〉（1964年2月5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17-01139-06。

㉞ 馬敘生：〈八十年代東歐問題回眸〉，載外交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編委會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五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70。